

音乐人文笔录

# 交响乐声七十年

杨燕迪

精选七十部交响作品汇编成集，以此向新中国七十周年献礼，这既是聪明的创意，也是严肃的立意。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出版社和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通力合作，携手上海音乐学院及业界相关专家教授，以专业品质推出三十张CD唱片《中国交响70年》，汇总1949至2019年间中国作曲家（包括海外华人）的交响乐优秀代表作，示范效应明显，学术价值重大。交响乐，公认是音乐中大型器乐体裁的标志性品种，不仅是作曲家创作功力的集中展现，更是各国音乐家体现各自历史文化和独特民族情怀的重要载体。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东风而滥觞，经萧友梅、黄自、江文也、马思聪、冼星海、贺绿汀等著名前辈协力推动，至新中国成立之时，已在交响曲、交响序曲、交响组曲、协奏曲、交响小品等诸领域有相当积累，为其后的中国交响乐发展奠定基石。

通观所选七十部作品和七十余位作曲家（少数作品为多人合作），这不啻为新中国交响乐的巡礼，从中可见七十年来新中国交响乐一路走来的步履和足迹。当然，一定仍有部分作曲家和代表性作品的遗漏——因有年代、比例、品种、版权、重要性、代表性以及可行性等多方面的考量与取舍。但通过这套唱片集，新中国交响乐的总体成就和大致脉络已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经上世五十年代新中国初创时期的清新质朴风格，通过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性音乐表达，至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多元、丰富而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中国交响全景大观。这个基本的轮廓其实不仅是新中国交响乐创作发展的存底与印迹，也是新中国整体社会文化进程的映照和心灵记录，因此这里鸣响着的不仅是交响乐的声音，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里能够听到当代中国人所经历的时代轰鸣与生命感应……

例如，新中国初始弥漫在全社会的欣欣向荣与单纯乐观的情志，便清晰反映在刘铁山、茅沅的《瑶族舞曲》（1952）、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1955）、李焕之的《春节序曲》（1956）等此时的代表作中。这些作品的音乐语汇往往直接选用中国本土的民歌、舞蹈或戏曲音调，而和声与乐队写作上又参照欧洲19世纪中后叶的“民族乐派”笔法，由此达成“民族化、群众化”的审美情趣。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催生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曲，1959）的传奇——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交响乐的最高潮与里程碑，它将中国的民间爱情传奇、地道的江南音调与外来的协奏曲样式和交响叙述完美融合，成就了此曲六十年流传不衰的公认地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上半，中国交响乐的创作发生转向，多以“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主旨，于是诞

生了以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9）、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1959）、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1963）等为代表的大型交响乐作品。显然，这类作品中最成功者当推吕其明的《红旗颂》（1965），它的主题旋律具有磅礴大气而一泻千里的性格，据此这首作品成为党旗的音响符号与代言象征，其感召力迄今不减当年。

而即便在“文革十年”中国交响乐总体陷入停滞的反常与困难时期，依然有交响合唱《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五首》（田丰，1970）和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刘庄合作，1970）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留存至今——以我的一己之见，《黄河》的豪情与张力，以及它以协奏曲的炫技、亢奋和华美织体重新整合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原作的气魄与创意，既让它成为彼时的时代映照，也帮助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进入改革开放，中国交响乐终于迎来全盛期：开放带来变革，中国融入世界，观念更新，价值多元，技法新潮。收入这部唱片集交响乐作品，改革开放以后的创作占据三分之二，这确乎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也极大地有利于改善公众与社会对近四十年来中国交响乐新创作并不十分了解的状况。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响乐创作所取得的业绩是巨大而多方面的，但不论演出、宣传、推广、研究与批评都嫌欠缺与不足——正是这个意义上，这部唱片集的编辑出版更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交响乐的历史进程，也有助于音乐界和社会更清晰地认识与评鉴中国交响乐的优秀代表作，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交响乐更迅速、更有效地走向世界。

具体到近四十余年的交响乐创作，我们看到一幅多元、复杂而令人有些兴奋的图景：几代作曲家同堂，海内外华人齐聚。丁善德、朱践耳、罗忠镕、杜鸣心、郭祖荣等前辈作曲家“老当益壮”，在达到生命高龄时仍新作迭出——其中最突出者为朱践耳，他作为交响乐创作中公认的“中国首席代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深刻的文化思考和崭新的音乐语言开除了中国交响乐的新篇章；他的艺术结晶是11部交响曲以及其他类型的一批交响力作。这部唱片集共收入朱践耳四部作品——交响组曲《黔岭素描》（1982）、交响诗《纳西一奇》（1984）、《第一交响曲》（1986）和《第十交响曲“江雪”》（1998），位居单人收入作品数量榜首。我以为这是公允的抉择，也是对这位已故大师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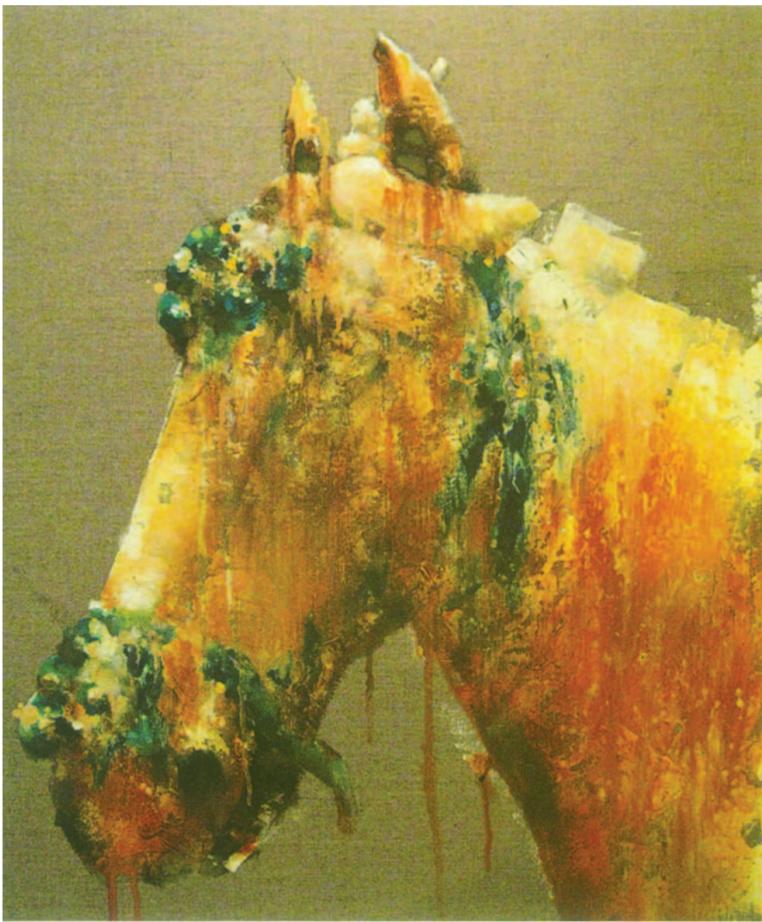
王西麟、金湘、刘敦南、杨立青、金复载、陆在易、鲍元恺、赵季平等一批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并具备扎实传统写作功力的作曲家，在近四十余年的交响乐创作中，一方面继承较为悦耳而有自然乐感的写作路线，另一方面也适当吸纳当代的创新音响技法，因而写出了稳健、真挚而富有表现力的诸多优秀作品——如色彩斑斓的钢琴协奏曲《山林》（刘敦南，1979），极富现场效果的“民歌主题管弦乐”《炎夏风情》（鲍元恺，1991），真挚感人而笔法细腻的交响合唱《中国，我可爱的母亲》（陆在易，1993），彰显作曲家同时熟稔民间曲调和乐队手法的交响组曲《乔家大院》（赵季平，2007），以及出色发挥独奏乐器和乐队性能的大提琴与乐队杰作《木卡姆印象》（杨立青，2011），等等。

“50后”“60后”乃至“70后”的

作曲家均属于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学院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他们的交响乐创作也必然携带着这代人鲜明的特定印迹——这代作曲家人数更为庞大，国际视野更为明显，对如何在音乐中体现中国精髓和中国性格也持有更为多样和多元的观念。陈其钢（《蝶恋花》，2001）、陈怡（《动势》，2004）、谭盾（《三个音的交响诗》，2011）、盛宗亮（《乐队协奏曲《生肖的故事》，2016）、周龙（《山海经交响曲》，2019）等著名作曲家均活跃在海外但根系中国。而中国当下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如叶小纲（交响组曲《咏·别》，2018）、郭文景（笛子协奏曲《愁空山》和《野火》，1995/2010）、唐建平（笛子协奏曲《飞歌》，2002）、关峡（《第一交响序曲》，2003）、朱世瑞（《乐队与唢呐《凤凰涅槃》，2008）、贾达群（交响舞剧《蝶恋传奇》，2006）、陆培（《相和歌》，2013）、温德青（唢呐协奏曲《痕迹之四》，2003）、张千一（《北方森林》，1980）、刘湲（《乐队托卡塔——火车》，1999）、许舒亚（《夕阳·水晶》，1992）叶国辉（《中国序曲》，2007）、秦文琛（唢呐协奏曲《唤风》，2010）等均以各自的角度在继续探索 and 深化交响乐的“中国化”课题。我们还高兴地看到梁雷、赵麟、周天等等更为年轻的名字，衷心祝贺——这是中国交响乐的明天和希望。

一部唱片集，七十年的声音回溯——在交响乐声中丈量品味新中国的成长与发展历程，这既是别样的历史体验，更是独特的音乐经验。值此新中国生日之际，祝中国交响乐之路前程灿烂、前景辉煌！

2019年8月28日改定于书乐斋



# 笔会

中国宝贝·唐马  
(油画)  
古原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怪作家》([美] 西莉亚·布鲁·约翰逊著 宋宇刚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版)的作者约翰逊对著名作家的爱好有持续探究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与所写作家相关的信件、回忆录、传记等，以这些素材为基础，完成了这本有趣的书。

《怪作家》一书开篇就说：“作家们是一帮很古怪的家伙”，某些作家的“癖好”让人称奇。比如：爱伦·坡写作时，常将一只猫放在肩头维持平衡；阿加莎·克里斯蒂一边在浴缸里啃苹果，一边构思小说里的谋杀情节；席勒在书桌抽屉里放满烂苹果，依靠这刺鼻的气味，激发创造力……

通读全书，著名作家可称为“古怪”的行为其实并不多，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只能说是不同的写作习惯，例如对纸张和墨水颜色的偏爱：大仲马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纸来写作——诗流泻在黄色的纸上，小说驰驱在蓝色的纸上，其他类型的文章则展开于粉红色的纸上。紫色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最爱，她最著名的作品《达洛维夫人》，大部分手稿是用紫墨水写成的。

在写作过程中，有些作家喜爱有饮品作伴。咖啡是巴尔扎克写作时永恒的伴侣。巴尔扎克通常晚上十点床上，凌晨两点在闹铃中醒来。他的工作时间始于星光闪烁之时，当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却文思泉涌。巴尔扎克每天要喝

## 将树林当成书房

朱朱

数十杯咖啡，浓度不够还不行。他喜欢劲头非常足的土耳其混合咖啡，他发明出自己的一套做咖啡的方法——少量的水和更精细的研磨，可以让饮品的效力更强大。当觉得咖啡的作用在减弱时，巴尔扎克就加大摄入量。当需要应急时，他甚至直接嚼生咖啡豆。一杯接一杯，以咖啡作伴，巴尔扎克写着史诗巨著《人间喜剧》。

塞缪尔·约翰逊则认为茶是文学完美的伙伴。他对饭菜兴趣不大，“只对泡饮这种令人着迷的植物感兴趣”。他的烧水壶几乎没时间凉下来。对约翰逊而言，“茶为晚上提供了消遣，为午夜提供了慰藉，也使早晨变得受欢迎”。雨果经常在夜里沿着巴黎的街道一边散步，一边构思新作。他是个大胆的步行者，即使在香榭丽舍附近遭遇过扒窃，依然“习性不改”。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说远足非常有助于激发灵感。他在随笔《徒步旅

行》中这样写道：“这个快步行走的人，眼中透着敏锐的神色，全然专注于他的思想，仿佛正站在他的织布机前，不停地织啊织，将风景织成词语。”史蒂文森自己就是这样——“将风景织成词语”的作家。1876年8月，在这篇随笔发表两年之后，他徒步穿越法国南部的塞文山脉，为期十二天，跋涉一百二十多英里。这次旅行，作家唯一的伴侣是一头倔驴。这次经历被他写成回忆录《带着驴子在塞文山脉旅行》。

著名作家劳伦斯喜欢在户外写作，将树林当成他的书房。他在写作时常常“倚靠着一棵树的树干，膝盖上放一本便笺簿”。35岁时，劳伦斯在德国黑森林地区过了几个月，在这个闲适的地方，他经常隐退到树林中，写他的第七部长篇小说《亚伦的神杖》。整本书是在户外完成的，在那里冷杉树静静地陪伴着他。劳伦斯享受过各种斑驳的树荫：在英格兰赫米提吉村的

礼拜堂农舍，他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椅子上写作；在意大利加尔诺，他在柠檬树林边工作，除了阅读《儿子与情人》的校样，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在墨西哥，他在湖边一棵柳树的拥抱下写作；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地点，是在托斯卡尼一株巨大的意大利五针松下……

有许多知名作家从喜爱的猫、狗等宠物身上得到灵感。斯坦贝克在《与查理一起旅行》中，写到他驱车带着他的狮子狗周游全国。伊丽莎·巴雷特·勃朗宁给她的可卡犬写了一首诗叫《致我的狗弗拉什》。她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她与弗拉什的关系：“它与我是不可分的一对，为了换得它的忠诚，我已经向它起誓，会成为它永远的朋友。”

T.S.艾略特在一封寄给三岁孙儿的幽默的信中写道：我很高兴你有一只猫，但我认为它不如我的猫惹人喜爱。

我们是在傍晚五点左右到达科莫镇的，距离太阳下山尚早。天气炎热，科莫湖和两岸青山像被罩上了一层迷雾，蓝不再澄澈，绿也不再葱翠。我们决定先躲进旅馆休息，缓解一下长途旅行带来的疲劳。

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三口游览了罗马、弗洛伦萨和威尼斯，好比连着饕餮三顿大餐，来不及消化。科莫湖是今夏意大利之行的最后一站，原本担当着“餐后甜点”的角色，因为在这个倒置的Y型阿尔卑斯冰川湖的两岸，散落着不少古老村庄和名人别墅。但我倒情愿给旅行提前画上休止符，只想呆在湖边消磨两日，哪儿也不去了。至于乔治·克鲁尼或者布莱德·皮特的气派别墅，就让它们停留在那本花花绿绿的游览手册上吧。

过去十天，我们在各大博物馆的奇珍异宝和名画雕塑间穿行流连，在一座又一座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城堡、宫殿、教堂的穹顶下驻足仰望，激起种种震撼、惊叹、欢喜、留恋的情感，正合了那本沉甸甸的导游手册扉页对意大利的形容：“超凡脱俗，无与伦比”。一份用Excel表格制作的自由行攻略，如同给行程穿上了一件骑士盔甲：从头到脚，厚实严密，它被不时拿出来核对和丈量足迹所到之处——旅行的快乐总是和一种虚荣的游客心理以及获取知识的“自我责任感”纠缠在一起。

来到科莫湖的第二天午后，依然骄阳似火，整个小镇悄无声息……我走到马路对面，沿着一个坡道来到湖边。

远处的湖面，对岸山腰彩色束带般的民居群落，乃至我身后的小巷旅舍和旅舍背后的山顶，都袒露在午后阳光下。万物专心于吐纳热气，唯独眼前这一方湖面，因为有了两块伸入湖水的长石板，头顶又有一棵苍翠大松和一株粉红夹竹桃遮挡拂照，显得清凉而活泛。我忍不住脱了凉鞋，慢慢走入水中。一簇一簇两三寸长的黑色小鱼儿在我小腿边游来游去，几米开外，有两只系在浮桥木桩上的白色小艇，被水波推动着，不时发出嘎吱嘎吱声，风灌进灰绿色的帆布罩，一鼓一鼓。偶尔远处湖面飞驶过一艘游艇，湖水荡漾的节奏便从柔板改为快板，急风似的涌来，发出清凉干脆的拍岸声。我蹚了一会儿水，心满意足，见四下无人，就把自己放平在其中一块长石板上，仰望松树的华盖和华盖外的蓝天白云，再闭目养一会儿神。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曾写华兹华斯喜欢在橡树下，聆听着雨声或者看着阳光穿梭于树叶间。华兹华斯说：“大自然会指引我们从生命和彼此身上寻找一切存在着的美好和善良的东西。自然对于扭曲的、不正常的都市生活有矫正的功能。”此时此刻的独处，的确有一种安神之效。我对橡树倒并无感，松树和夹竹桃却是自幼熟悉的江南树种，在意大利也随处可见。松树总是唤起一种远古的信任，它深沉的生命力，使躺在它树荫下乘凉的人，无论身处何方，年龄多大，都像是一个受到庇护而变得自在的孩子。

再眯眼望望湖对岸山腰上的那些房子。显然，意大利人热爱鲜明的颜色，外墙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了，房子的样式却是不那么讲究，在阳光照耀下却一派质朴坦然。在我看来，意大利的有趣，也因为那么一点杂乱参差，和那么一种随意自在。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它的三个邻居——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都是爱整洁和优美的“模范生”。在邻居那里，尤其是小城镇，处处屋舍俨然，精致美丽，临街窗户无一不点缀着鲜花与蕾丝窗饰——如同乐高积木搭建的童话世界，绝不允许有一个灰暗角落。翻过山到了意大利，城镇景观一下子起了变化：陈旧民居与富丽宫殿间杂错落，恢弘教堂与断壁残垣交相辉映，就连人脸上的表情，也有一种漫不经心。

我漫无目的地遐想着，身体越来越放松。松风沙沙，蝉鸣绵长，天空、

他所提到的这只猫，是一只名叫杰利罗兰的宠物。这只小猫在艾略特关于猫的诗集《负鼠的猫经》中获得不朽，还是据此诗集改编的音乐剧《猫》中的一个角色。

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有各种禽鸟，包括鸡、鸭、鹌鹑、孔雀等等。曾经有拜访她的人看到有四十只孔雀像炫耀一般，在她的农场上昂首阔步。这些引人注目的生物多次出现在她的小说里，她还专门为它们写了随笔《众鸟之王》。

灵感可能转瞬即逝，如何及时抓住？作家各有妙招——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结尾便是在一辆巴士上想到并及时记下的。

伍迪·艾伦在搭地铁时写作。他说：我边拉着吊环站立，边取出铅笔，等我出地铁时，我已写了四五十个笑话……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乘飞机时仍坚持写作。她说：钢笔可能会漏水。飞机上不能随身带小刀，如果铅笔笔芯折断，无法在飞机上削笔芯，所以她建议：上飞机时带两支铅笔。

《怪作家》的作者意在探寻著名作家写出好作品的秘诀，可归根结蒂，得到的只是常识：写出好作品，除了要有足够的天赋，还需善于观察生活、勤读勤写。——这样的“探究”结果也许会让部分读者失望，可是，这个“常识”的确就是写作成功的秘诀啊。

# 从科莫湖归来

黄雪媛

湖水和树影包裹着我，使我有如一枚树叶，安然卧于石上……若不是远处天空有直升机飞过，螺旋桨发出巨大的呼噜声，我甚至回到浙江乡村童年的错觉。真奇妙啊，千山万水地来了，最令人愉悦的时刻竟然最接近童年记忆：大人在堂屋竹塌上午睡，小孩溜出去在村子小溪边和山脚下游荡的那些下午。当陌生之地展现出故乡的依稀面目时，人就像踏入一个遥远的梦境……

下午五点以后，沿湖小街渐渐热闹起来，两家餐馆打开了大门，几家之遥的小卖部也开张了，我们一家人慢吞吞地踱去小卖部买棒冰。有几个本地的意大利爷叔，穿着随意，正聚在小卖部门口喝着啤酒，大声地聊天。不懂一门语言的好处在于，那一串响脆的音节落在耳膜里会激起更多的联想。有时我会凝神静听那些陌生音节的组合，试图揣摩它们传达的内容和情绪。在罗马或弗洛伦萨的闹市街头，我常看到荷枪实弹的巡警围成一圈，神情轻松地聊天，我就故意紧挨着他们走过；在街巷里偶然相逢的两个老友，彼此更是扯不断的话，大珠小珠落玉盘般落在弹格子路上；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两个值班大叔大概闲得无聊，其中一个就唱歌给另一个听，唱到一半，忽又停下，热烈地向伙伴解释着什么，复又唱起来，那歌曲的旋律像门外的大运河，开阔中有起伏。我暗叹，原来这就是帕瓦罗蒂和安德烈·波切利这些杰出歌喉的民间基础。眼下这小卖部门口的“龙门阵”，话题想来和昨日的彩票或者某场球赛有关联吧。我胡乱猜想着，从他们中间穿过，像绕过小时候外公和邻家叔伯围成的麻将桌一样自然。

我们已买了各自喜欢的棒冰，走到马路对过，凭栏望湖……在我们身后，是一个用铁栏杆围起来的塔楼般的建筑，塔里面供着一幅圣母抱婴的陈旧壁画，地上端端正正放着一束花。在罗马和弗洛伦萨饱览了最杰出最恢宏的教堂壁画之后，偶遇这么一个昏暗逼仄简陋的神龛，好比从灵隐寺到了乡下土地庙，可以不必端然了。左下方二十米开外的一个浅滩，传来阵阵笑声和哗哗拍水声。有几个年轻人和孩子泡在湖里嬉戏，岸上的人们或搬来躺椅，或者把彩条浴巾铺在岸边小石子上，躺着，坐着。有时，岸边人与湖里人展开着零星的对话，英语的，意大利语的，偶尔也夹杂着几句德语，在湖面上来回穿梭，带着山谷的回音。

随着时间流逝，热气渐渐消退，湖水呈现出洁净的深蓝色。我朝餐馆那边望去，凉棚下的几张藤条四方桌已经铺上了洁白的桌布，餐具和面包篮也都摆上了，凤仙花在金色夕阳中轻轻摇摆。七点半，晚餐时间到了，我享用着晚餐，直到对岸灯光渐渐亮起，直到夜空点点繁星闪耀，夏夜仿佛赠与我无穷无尽的时间，而我也在这一日又重拾了“慢”的乐趣。

返回上海后，回顾这次旅行的种种，我不由得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驱使我们抛弃种种家中的舒适，奔赴远方的未知？应该不仅仅是出于打破一以贯之的日常模式的欲望，也不仅出于对异域风情和历史文化的向往。旅行会是一个人的身心融入陌生新鲜的养料。一具移动着身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接收器，它会与周围的一切产生共鸣。当它和当地的空气、食物、建筑的空间，山川、花草虫鱼等亲密接触时，获得的就不限于“知识”和“视野”了，而是无数细节构成的“感知”——一种刹那发生的崭新的生命形态。而旅行中放慢脚步，往往让人体会更多，并获得意想不到的快乐。

套用恺撒的那句名言，“我来，我见，我赢”，我想说，旅行是，“我来，我见，我悟”。